

# 一体化、话语权与代议制：当代欧洲民粹现象的三维视角

储 殷

**内容提要：**随着英国“脱欧”，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出现了重大倒退，但是，当代欧盟国家的民粹危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欧洲一体化引起的不适或是全球化失意者的反抗。反一体化的民粹思潮揭示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严重的不平衡以及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在全球化与新媒体时代面临的严重合法性危机；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劳资平衡的解体；其二，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终结”带来了话语的贫困；其三，“欧洲一体化”造成的代议制民主下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而新媒体时代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精英统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持续可能带来对代议制民主的深刻反动，既有可能使欧洲出现某种强人政治，也有可能让大众与精英在未来的政治过程中形成某种新的平衡。

**关键词：**欧盟 一体化 全球化 民粹主义 代议制

如果说近年来，希腊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匈牙利欧尔班的“青民盟”、波兰卡钦斯基的“法律与公正党”这样一些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力量的胜利，还被视为欧洲边缘地带的社会危机或是民主政治不成熟的结果，那么在过去的2016年，欧盟主要国家英、法、德民粹力量的兴起则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安。随着英国的“脱欧”、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以及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的一系列失败，而大西洋彼岸特朗普又赢得美国大选，曾经被视为人类发展理想之一的欧洲一体化，似乎正在面临重大倒退的风险。中国的知识界对于这样一种民粹主义趋势总体上秉持批评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作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中国人，对于“全球化”、“一体化”有着天然的好感，而且相当一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与精英对民众的操纵、政治

化约主义,以及多数暴政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看作一种消极的至少是危险的现象。<sup>①</sup>然而,民粹主义的批评者们,并不能否认民粹背后社会撕裂的现实,也不能解释大众运动为何走向抗议性的民粹而不是建设性的变革。

## 一 欧洲民粹危机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民粹主义在欧洲复兴的现实诱因,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欧洲缺乏竞争优势的经营者和劳动者相继陷入困境;二是欧盟债务危机出现后,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选择出资救济濒临破产的政府,这种做法在民间缺少普遍共识;三是“移民海啸”给欧盟各国带来了难以消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sup>②</sup>但坦率来说,这三个诱因只是描述性的,诱因背后的原因及其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却是复杂的。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收场为西欧走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捆绑的死结提供的一次历史机遇。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发端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国家权力场域,又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权力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不管是“由手工业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蜗牛式的道路,还是由商业控制产业,尤其是大商人投资设厂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道路,<sup>③</sup>国家权力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中介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对于前者来说,诺斯口中的国家制定产权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资本主义何以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获得成功。对于后者来说,封建国家的特权阶层本就是这种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推动者。在伊丽莎白时代,许多贵族、官僚都从事工商业活动、海外掠夺或甚至公开的海盗活动。不少贵族从事圈地养羊、工商业活动,甚至从国会获得特权,垄断一方贸易。这种从事大工商业的贵族最终形成了具有强烈资产阶级气质的新贵族阶层。而在法国亦有大批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通过大批买地、买官获得权力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形成了穿袍贵族阶层。<sup>④</sup>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往往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如果它萌生于一个没有生存压力的大国,那么它通常会面临过大的保守势力的阻碍而无法冲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如果它萌芽于处于激烈生存竞争的国家之中,那么它往往又是国家为了富国强兵而进

① 参见秦晖:“‘社会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论及其转向”,《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3期,第5-18页。

② 参见张莉:“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第70-80页。

③ 参见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8-191页。

④ 参见陈曦文:“英国都铎时代伦敦商人的财富和权力”,《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第28-36页。

行的策略选择,它的资本属性必须受制于现实的国家权力生存的需要。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之所以多采取保护市场,奖励农业的举措,<sup>①</sup>一方面固然是资产阶级将追求利润、保护财产的需要融入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却是主权者为了战争能力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求更大市场、更多利润的全球化抱负与资本国家属性之间的紧张,最终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此扩展到全世界,并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制造出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sup>②</sup>作为中心的本土资本的民族属性与殖民体系中为本土资本所激活的其他地域资本之间出现严重的冲突。这种经济上的冲突最终与宗教、文化等多种因素凝聚成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冲突。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并且发展特别迅速,因此在这里巨大的民族差别的泯灭,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迅速、更加彻底,<sup>③</sup>并最终上升为“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语言自由和人民代议制”的政治要求。其二,欧洲各国之间的两次大战最终使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位置为美国所占据。

二战后,由于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对西欧地区事实上的武装占领,西欧资本主义得到了一个摆脱国家属性的历史机遇,这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能够迥然不同于其他区域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冷战结束以前,尽管这种过程由于西欧国家的恢复而出现了一些反复,但总的来说仍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最终导致了欧盟这一超国家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欧洲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其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也得到了不同理论视角的解读。有学者认为,<sup>④</sup>欧洲一体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嵌入,即不存在一个宏观的一体化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马赛克式”的嵌入拼图,各种理论学派和学说交织在一起。从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制度设计(联邦主义)、理论推演(功能主义)、现象解释(新功能主义)到中层理论解析(后功能主义、制度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和具体领域(机构、治理、决策、认同)研究的发展进程,<sup>⑤</sup>但在这一研究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始终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导致“一体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被相对忽视了。

<sup>①</sup> [英]埃里克·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368页。

<sup>④</sup> Mark A. Pollack, “Theor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omestic Polity or Experiment in New Governa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2005.

<sup>⑤</sup> 参见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9页。

其一,欧洲一体化始自马歇尔计划以多边机制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取代原来的美英、美法双边机制,其目的就在于为欧洲各国的重建项目提供资金,促进贸易自由化、创造贸易支付系统的便利以发展欧洲国家间贸易。<sup>①</sup>由于西欧国家在战后初期的衰落,立足于区域而非国家的OEEC成为欧洲经济重建工作的信息中心和最重要的决策中心之一,这从一开始就将西欧的重建与西欧各国工商业的跨国整合捆绑在一起。自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设立之后,欧洲各国的生产者就意识到了OEEC的重要性。一些跨国利益集团就此开始建立以加强行业间的跨国沟通,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稳定的联系以获取马歇尔计划资源分配以及欧洲经济重建的相关信息,并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反馈到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方面的代表性组织包括:欧洲工业联盟理事会、欧洲复兴计划工会建议委员会、国际农业生产者欧洲委员会、欧洲独立企业理事会等。1949年之后,欧洲有至少58个非官方的跨国组织得以建立,其行业涵盖了制造业、批发零售和进出口等。<sup>②</sup>可以说,OEEC不仅在促进欧洲产业恢复和消除欧洲国家间贸易壁垒上取得了很大进展,<sup>③</sup>而且塑造出了一个赞同经济和产业力量进行跨国整合的利益集团。时任德国工业联盟主席的弗里茨-博格指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联合的欧洲。产业和经济问题早已超越了国境,一个欧洲的、西方的经济必须取代国家层面的经济。”<sup>④</sup>许多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者通常将煤钢共同体视为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却忽视了在政治家的标志性政策之前,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量已经形成,那就是战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对跨国贸易、区域大市场的共同追求。

其二,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相比于有产者的联合,无产者的联合极不成功。劳工同盟对于欧洲一体化中制度设计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工商精英。自1952年《巴黎条约》订立、煤钢共同体成立,共同体机构开始获得了超国家的权力(如废止成员国间关税障碍、发放补贴、煤钢价格干预、部分税率的制定等)<sup>⑤</sup>,到1958年《罗马条约》生效之后,煤钢联营扩展到共同市场的建设,“共同体经济圈”向更广泛的领域发展,再到1986年旨在建设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单一欧洲法令》,1991年末《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成立欧洲联盟,工商业利益集团跨国整合的力度在大多数时候处于不断加强的趋势(只在“卢森堡妥协”后有所减弱),不仅传统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如“欧洲工业和雇主

① OECD, *Explorations in OEEC History*, OECD Publishing, 2009, p.34.

② 张海洋:“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研究:历史沿革、机制运作与案例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4年,第19-23页。

③ OECD, *Explorations in OEEC History*, pp.38-40.

④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Fünf Jahre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ergisch-Gladbach, 1954, p.174; Quoted from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21.

⑤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联合会盟”和“欧洲企业界圆桌会议”仍然对欧盟政策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力,而且在一些一体化政策扩展到的新领域内还不断地有强大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出现,如由欧洲能源消费行业的8个大型企业联合组成的“能源消费利益集团”和由贝塔斯曼、IBM、麦克米伦、飞利浦电子公司等国际传媒巨头和ICT产业巨头联合组成的“国际通讯圆桌会议”。<sup>①</sup>

与资本联盟“不断增强、致力于在共同体层面表达和维护产业界的利益,促进产业界团结”<sup>②</sup>相对应的是,劳工阶层泛欧整合的努力却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意义上的进展。虽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ICFTU)和基督教色彩的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ICCTU)做出了许多跨国整合的努力,而且共同体各成员国的工会,也保留着其对成员国政府的影响力,并经常通过成员国政府来影响共同体的立法,但随着大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衰落,规模更小、雇员更分散的企业越来越多,以及各国工会利益的多元化,劳动者的组织和集体行动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一体化中的劳资不平衡,突出体现在共同体决策过程中劳资的不平等,即在许多经济领域、市场问题上共同体采用的是特定多数表决,但在雇员权益和社保等领域,其决策方式仍是一致通过。劳工阶层要发挥政策影响力,其面临的门槛过高,反映出欧盟存在的基础本质上仍是经济共同体,欧洲一体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自由市场的扩展,而非工人运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工的力量在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一直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压力。<sup>③</sup>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内部,出于维系社会安定与共同体生存(尤其是在外部安全危险加大的情况下)的需要,劳资双方还有可能在第三条道路中携手并进的话,那么当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带来的利润不断扩大、安全风险不断降低(苏联解体、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劳资双方同舟共济的必要性就大大减弱了。在温情脉脉的欧洲精神的面纱下,欧盟内部正出现两个完全不同身份的阶层,那就是高度国际化的精英阶层与局限于一国境内的劳工阶层。一方面,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精英群体在各个层面的竞争中都占据优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要求开放市场、开放投资,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与最大的利润,反对国家以政治力量保护“落后”的社会。而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则日益面临被“甩出社会结构”的危险,对于通常只掌握一两门简单技能的底层劳动者而言,不断更新换代的现代经济活动与日益扩大的全球竞争让他们处

① 张海洋:“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研究:历史沿革、机制运作与案例比较”,第31-33页。

② History of the Organization, [http://www.businesseurope.eu/content/default.asp?Page\\_ID=601](http://www.businesseurope.eu/content/default.asp?Page_ID=601), last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③ 张海洋:“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研究:历史沿革、机制运作与案例比较”,第34-35页。

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开放的经济秩序中,技术含量低的岗位最容易受到结构调整的影响,其就业人群也最容易成为全球一体化中被更便宜的外国工人所取代的对象。在英国,虽然卡梅伦政府在2010年以来,成功地稳定了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的经济局面,但在精英们攫取更大的欧陆统一市场的红利的同时,英国国内平均工资却连续下降了8年,降幅高达8%。为了降低英国的财政负担,保证其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卡梅伦政府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让原本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分化已经很严重的英国严重撕裂。这才是底层民众最终与政商精英分道扬镳、选择脱欧的根本原因。在法国,国民阵线的崛起背后同样是大量被社会抛弃的愤怒底层。如法国学者图海纳所言:“过去的法国社会相当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都处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今天的法国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这些人甚至已经不是堕入底层,而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了。那些坚持跑下去的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最多只有四五百万。”<sup>①</sup>

从本质上讲,尽管欧盟由于平衡美国霸权、抵御俄罗斯复兴、加强治理能力等目的,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在某些领域的确展现出成为联邦的意图,但成为一个国家带来的资本利润率下降与追求利润的资本全球化之间是存在根本矛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是资本与国家权力融合导致的超国家制度安排,其动因在于二战后西欧资本集约化进程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sup>②</sup>就此而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以及欧盟权力的扩张,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调整的结果。<sup>③</sup>欧盟的跨国化制度建构只是为立足于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寻求摆脱资本利润率下降的制约性提供了新的选择与场所。它虽然在某些领域承担了曾经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承担的部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职能,并因此与民族国家的主权相冲突,但它并无真实意愿成为一个国家。事实上,国际化的资本精英阶层只是把国家当做解决自由市场副作用的垃圾筐,当他们从自由流动的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大肆获利后,把失业、贫困、移民等一系列自由化的代价留给了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那是因为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机器把工人从国家的主人物化成了没有祖国的劳动力。可是今天,资产阶级甚至通过制造超国家的制度来突破了国家机器对自己工具层面上的限制,成为了没有祖国的主人。

<sup>①</sup> 参见孙立平:《断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sup>②</sup> Ernest Mandel, *Europe V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55-94.

<sup>③</sup> 参见贾文华:“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44-51页。

## 二 民粹运动中的话语权力缺失与重构

如果说不平衡的“一体化”带来了国际化资产阶级与国内无产阶级的深刻对立,并引发了欧盟国家内部的“民粹”怒潮,那么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诉诸阶级意识的话语却缺席了。在具有深厚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反抗运动中令人困惑地陷入了沉默。诸如法拉奇(Nigel Farage)、约翰逊(Boris Johnson)这样的民粹主义者、疑似种族主义者却成为站在工人阶级身前的掌舵人。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而且是因为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指的政治的非政治化的必然结果。齐泽克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鲜明对立已经消失了,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突出表现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消失不见了。资本及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了支配经济运转的一种内在的客观机制,由于人类社会把资本与市场机制看成是一种中性的工具和机制,因此人类社会也丧失了找到多重性政治行为背后真正根源的能力,而只能求助于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在后政治时代中,意识形态观点的冲突被开化的技术精英和自由文化多元主义者间的博弈所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共识。这个世界的阶级对立被表述为基于不同利益的平等博弈,宏大叙事的阶级话语被抛弃,政治成为专业化的、碎片化的、面对具体需要与要求的非政治事务。政治的冲突被消解为文化的冲突,政治问题的解决被替换为理性协商和各种现存框架之内的折中方案。总的来说,就是政治退化了,被去政治化了。<sup>①</sup>

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尤其是让无产阶级丧失了对于经济政治性的批判意识,市场规律、私有制、专利权这些曾经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已经成功地逃离政治批判的视域。换言之,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批判虽然不乏反抗与愤怒,但是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根本秩序已经不会有任何的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非政治化了,经济已经被排除在政治的领域之外,而资本和市场也就此被自然化和永恒化了。<sup>②</sup>

当无产阶级最需要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永恒的自然现象,无产阶级的反抗就从主体性上的自觉向碎片化的自发滑落。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近十几年来,西方左翼运

<sup>①</sup> 参见[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sup>②</sup> 参见莫雷:“后政治时代政治介入何以可能”,《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第68-73页。

动蓬勃开展取得了许多的成果,但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碎片化、平权化与去中心化的特征。<sup>①</sup> 尽管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动物权利运动、生态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生代文化认同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都可以涵盖在新社会运动的范畴内,<sup>②</sup>也都在不同侧面呈现出了无产阶级作为先进阶级的解放意识,但是这些运动却是高度离散的,尤其是缺乏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如果说,现代化带来的细化分工,尤其是技术性白领阶层与蓝领工人的分化,使无产阶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上而下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那么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经济生活的自然化、永恒化,则从根本上削弱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抗资本主义秩序的可行性。在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中,尽管愤怒的社会底层可以不依赖正式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合法化或公民社会的团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分歧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sup>③</sup>但这种参与却是四分五裂和缺乏整体意识的。它让无产阶级运动的主导权最终为微观层面的现实利益所绑架,从而丧失了从本质上改造世界的革命性。也正是因为当代西方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去意识形态化,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愤怒最后必须借助资产阶级的政治符号予以表达,也导致了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保守主义为特征的地方主义的资产阶级成为反抗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正是在鲍里斯·拉法奇甚至特朗普这样的本土主义者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不道义的经济制度偏移到同样深受全球资本主义压迫的外籍无产阶级身上。对于这些偏离了方向的无产者来说,维护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权红利,比反抗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加重要,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是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更深的压迫。

在有关脱欧公投的社会评论与学理讨论中,对于民粹主义的批判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正确”,但是民粹的形成,根本而言是因为民众意识形态上的贫困。恰恰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贫困,所以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苦的底层民众无法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并难以摆脱碎片化、去中心化的行动困境。要塑造从自发到自觉的无产阶级,就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与民众在全球化的漩涡中也认识到这一点。如杰克·法默尔(Jack Farmer)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马克思”。<sup>④</sup> 然而“马克思的归来”,不是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爆发,而在于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这种矛盾做出自觉解释。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① 参见张帆:“后危机时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特征及其实质研究”,《理论月刊》2015年11期,第109-114页。

② Hank Johnston and Albert Melucci, *New Social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Michael J. Jensen and Henrik P. Bang, “Occupy Wall Street: A New Political Form of Movement and Communit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Vol.10, Issue 4, 2013, pp.444-461.

④ Jack Farmer, “Why Marx Was Right”, *Socialist Review*, Issue 6, 2011, p.359.

之上,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一种直接地和自动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简单机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总是能够被揭示出来。<sup>①</sup> 在后现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当中,随着多元社会的到来以及民族国家同质性的消解,无产阶级不仅为社会分工所切分,也深受族群、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他们往往仅能自发地反抗资本主义,而无法自发地产生整体性的阶级意识。这导致了在诸如英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中,丧失了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其中的原因有两点:其一,苏联与东欧的失败被描述为违反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市场经济成为被统治阶级的“常识”。这意味着,尽管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存在普遍而激烈的不满,但在文化上却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领导,而文化领导权意味着可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它促使人们将其视为“常识”进行自觉信奉、遵守,从而对人们产生了规范的约束力。<sup>②</sup> 葛兰西认为,从属阶级对于统治阶级领导的“同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市民社会广大民众自觉的、积极的“同意”。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国家可以借助于知识分子在教会、学校、新闻机构、文艺团体等民间机构中发挥作用,有效地确立和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促使广大民众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当做“常识”来自觉信奉;可以借助与工会等工人组织、团体的谈判,在不危及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适当的妥协、让渡部分权益,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工人团体参与政府的管理,以表面上的“民主”形式,获取工人集团对其统治的认同;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设出现了问题。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主义政党自上而下塑造的。正如葛兰西所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只能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去寻求,只能在共产党中去寻求。<sup>③</sup> 无产阶级只有在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引领、教育之下,才能够超越族群、分工、文化和性别等因素,从碎片化的各自为战整合成为代表社会先进文化与生产力的领导阶级。然而随着苏联的失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共产主义政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而且丧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视野。这直接导致了西方无产阶级政党呈现出过度追求本国工人阶层私利,敌视移民工人阶层与外国工人阶层的庸俗化倾向。这种工人政党的庸俗化倾向促使阶级斗争为本国工人特惠的主张所取代,倒向了资产阶级右翼所主张的保守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这也是西

① [意]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磷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参见潘西华:“‘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基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方工人政党最终丧失了反抗全球资本主义运动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原因。

### 三 代议制的失灵与体制变革的可能

正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化资产阶级精英与国内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又丧失了反抗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话语权,欧洲国家才会出现带有强烈“疑欧”、“脱欧”色彩的民粹运动。因为一体化的速度与进程虽然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决定,但其在跨国政治范畴内更多地体现为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博弈,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sup>①</sup>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分散于各国之内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往往是隐藏于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国内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精英之间对国家机器的争夺。在近几年中,发生于欧盟诸国内部的一系列反一体化政治运动,无论是希腊激进右翼联盟的执政还是英国的脱欧、法国的勒庞现象,其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一系列政治标签背后,都隐藏着阶级斗争对一体化进程的反制约,即国家并非是简单的工具,也不是受统治阶级随意支配的制度机器,其存在与变化取决于具有多元决定性的社会形态的总体需求,<sup>②</sup>而一体化的物质基础虽然在于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但其进程与速率不仅仅决定于资本的需求,同时也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sup>③</sup> 正是在这样的反抗中,国际化的精英与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对立被呈现、被强化,而成为欧盟各国民粹运动最重要的特征。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民粹主义,都普遍强调对“人民”的极端崇拜。“权力属于人民”不仅是民粹主义最根本的合法性,而且是其最直接、最普遍和最有力的动员口号。民粹主义在提出“人民民主”要求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居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的反对,<sup>④</sup>把人民民主作为一种选择来反对当权集团的意识形态。<sup>⑤</sup> 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兰芒集团、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瑞士人民党和荷兰富图恩名单等政党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奋斗的纲领。正是通过将“人民”与“精英”、“移民”对立起来,民粹主义才能成功地激起社会大众热烈的回应与参与,并借助被其激发的社会排外心理赢得选票,获得执政机会。<sup>⑥</sup>

坦率而言,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对于“反建制的政治力量通过发动群众在代议制

① 贾文华:“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解释”,第44-51页。

② Bob Jessop and Nicos Poulantzas, *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5, pp.175-177.

③ S.Picciotto and H.Radic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 and the State”, *Bulletin of the CSE*, Vol.1, No.1, 1971.

④ E.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1977, pp.172-173.

⑤ Ibid., p.174.

⑥ 参见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民主当中获取权力”这一政治现象的回应是苍白无力的。它们对此的通常回应是把民粹政党的成功视为某种操弄民意——动员型政治参与而非真实民意——自主型政治参与的结果,即民粹运动的成功并非人民主权的体现而是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偏见的政治策略,<sup>①</sup>是受操纵的民主,<sup>②</sup>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道德指控完全无视了体制内精英在选举时毫不逊色的操弄民意的现实,从而让这种指控显得像是输不起的要赖;而另一方面,它也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政治参与是很难被截然划分为“自主型”和“动员型”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类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任何个人的政治参与都是由两者交织而成的。<sup>③</sup>

事实上,民粹运动从来不是如批判者强调的那样不堪,也并不都是操弄民意的投机者发动的狂热游戏,虽然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保守落后的民粹运动,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民粹运动具有进步意义。俄罗斯民粹派与美国的人民党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sup>④</sup>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出现过科贝特、柯尔津治、卡莱尔等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法国在资本主义迅速上升的18世纪,出现了麦斯尔、拉梅内这样的民粹主义者。进入20世纪,一些东方国家先后开始了本国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如印度的古斯、日本的北一辉等民粹主义者。<sup>⑤</sup>在任何人类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一旦精英严重脱离大众,民粹主义者就会顽强地在政治生活中声张大众的权力。西方社会政治参与的扩大、代议制民主的优化,从来不是顶层设计者良心发现的产物,而是民粹运动斗争的结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代议制民主的实践与人民主权的实现存在紧张关系。一方面,欧洲人民主权的信念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它不仅来自日耳曼人部落大会的传统,<sup>⑥</sup>而且随着12-13世纪的罗马法复兴与“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而成为中世纪伊始就被教会和世俗王国广泛承认的政治原则。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不仅将君主视为共同体的代表,而且在宗教领域内贯彻了“治理大家的人须由大家来选出”的基本原则,如教皇利奥一世就曾明确指出:“如未经教士选举,得到人民的认可……任何人不得被任命为主教。”<sup>⑦</sup>但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代议制的民主实践却从来对人民主权玩着同床异梦的把戏。在欧洲代议制民主的早期实践中,共同体只是被视为抽象的整体,它是由不同等级、团体构成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由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而

① 参见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郭中军:“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页。

③ 郭秋永:《当代三大民主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第129-131页。

④ 中央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⑤ 张岷:“民粹主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第133-135页。

⑥ 丛日云、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第74-83页。

⑦ 同上。

在“政治权力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应在人民的同意下行使”等命题中,“人民”的含义都是抽象和笼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虽然继承了雅典城邦大会与日耳曼部落大会直接民主的信条,但在实践中,却从来属于少数的贵族、僧侣与特权集团,它不但与雅典民主-直接民主同名不同系,<sup>①</sup>而且事实上更像是雅典民主的反义词。<sup>②</sup>在最早出现代议制民主的英国,代议制民主从一开始就不是人民主权的。它是贵族为了遏制专横的王权发展起来的,<sup>③</sup>其目的是基于保障贵族财产和自由的考虑限制王权,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参政需求,并将可能会带来躁动和危险的人民大众排斥在政治之外。<sup>④</sup>不仅《大宪章》的目的是限制国王对教会和贵族征税的权力而非实现平等,而且即便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议会主权原则的确立也只意味着传统贵族和经济贵族的胜利,而非人民主权的实现,甚至辉格党支配下的议会也趋向于限制而不是扩大选举权的授予,许多穷人都丧失了他们原有的选举权。英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非常清楚,自由的国家与不享受选举权的劳苦大众是共存的,穷人在经济上必不可少,在政治上却是危险的。<sup>⑤</sup>在英国代议制民主初期的实践过程中,具有人民主权倾向的平等派和掘土派一直都是被边缘化与压制的对象。<sup>⑥</sup>民主所保障的个人权利也绝不是指在英国人口中占据大多数的农民大众的权利。<sup>⑦</sup>即便在英国议会主权确立的100多年之后的1832年,全英国2400万居民中也只有40万人,即六分之一人民享有选举权,它仍然是一种寡头政治,而非民主政治。<sup>⑧</sup>

恰恰是以无套裤汉为主力、以卢梭、罗伯斯庇尔人人平等的社会契约论为信念的法国大革命,把实在而非抽象的人民主权嵌入了代议制民主中,这是因为法国底层平民诉求的是平等,而非英国贵族追求的自由。这也正是法国大革命具有远胜于英国革命影响力的原因,因为它改变了那种精心限制人民民主的英国代议制民主,而真正地将民主与人民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尽管法国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所激发的民主热情却在英国掀起了不断扩大的大众意识,并推动了英国代议制民主在1832年、1867年、1918年和1969年的多次重大改革,并最终极大地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这也是大多数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的进化过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限制民主为目

①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② 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8页。

③ [美]哈罗德·戈斯内尔、[美]理查德-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④ 参见张国军:“选举民主的困境及超越”,天津: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26-137页。

⑤ [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民主》,孙荣飞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⑥ [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公元前508-1999年》,林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⑦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⑧ 参见苏瑞林:《民主欧洲的旅程——从雅典城邦到欧洲联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的之代议制民主与人民主权的紧张关系彻底消除。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始终与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同意的需要纠缠难分。为了避免“乌合之众”的破坏力,西方代议制民主最终发展出了一套以选举民主实现寡头统治的复杂体系。一方面,大众可以在罗伯特·达尔所谓的民主市场中用选票选择自己认同的精英;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权力又始终处于米歇尔斯所描绘的寡头的铁律中。在这样的一套体制中,政治巧妙地与大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大众只是一个冷漠的、不具备自主意识、定期被唤醒投票的客体。资本主义的统治秘术是创造出了“去政治的市民空间”与“没有批判意识的消费社会”,在个人权利的幻象之中,用娱乐至死的套路去制造着单向度的人。精英们只需要小心地控制着可能启蒙与动员大众的舆论场域,慷慨地对大众施加福利,即可维持这套体系的圆满运作。

问题在于,所有稳定体系的最大敌人就是不确定性,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sup>①</sup> 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内外两个西方资产阶级精英所无法预料的变数:在外部,中国利用全球化成功地实现了崛起,并根本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的崛起不仅打破了西方中心在全球化中的垄断地位,而且正在提供一种全新的、更加公平的全球化的模式。这极大地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衰落过程,并引发了其内部更加严重的阶级对立。在内部,作为娱乐和消费场域的互联网、新媒体,成为去权威化的大众动员的孵化器。一方面,虽然仍然深受权力的干扰,但相比于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深受社会精英控制的传统媒体,大众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话语权大大增强。虽然操纵议题、歪曲消息、引导传播、屏蔽言论仍是常见现象,<sup>②</sup>但是其控制力度已经大为削弱,在即时聊天、小众交流的情境中,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情绪、获取信息的能力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具有“数字的、交互的、超文本的、虚拟的、网络的和模仿性的”等特点的新媒体正在促成非官方的传播共同体的出现,<sup>③</sup>这使得大众意识能够在一种相对去权威化的情境中发育。这种情景其实极其类似于平民党时期盛行于美国的小册子<sup>④</sup>与查尔斯·考夫林、迈克·斯考特、拉斯·林博在20世纪的广播电台。<sup>⑤</sup> 另一方面,线上与线下的结合以及互联网小额金融的发展,如同以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② 参见陈龙:“话语强占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实践”,《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0期,第16-21页。

③ Martin Lister, Jon Dovey, Seth Giddings, Iain Grant and Kieran Kelly,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9, pp. 10-12.

④ [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卷),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12页。

⑤ [美]杰克·凯、乔治·W·西盖尔穆勒、凯文·M·敏奇:“从考夫林到当代谈话电台:美国民粹主义电台的宣传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4期,第84-90页。

任何一次社交领域内的技术一样,都让社会运动的表演和 WUNC (worthiness、unity、numbers、commitment) 展示发生了转型,<sup>①</sup>并让大众找到了一种摆脱老政党的组织方式,从而催生出卡特尔政党体制所完全意想不到的政治对手。人民主权再一次从代议制民主的控制中逃脱出来,并挑战这个试图驯化它的体制,让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越来越难掌控自己的命运。<sup>②</sup>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民粹浪潮,恰恰反映了不断扩展的政治参与带来的人民主权与不断国际化的由精英所把持的代议制民主的冲突。这种冲突使西方代议制面对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危机:要么成为密尔所指出的由于选举权的不断下降和扩大走向的集体的平庸;要么成为密尔所说的以代议制民主的形式来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sup>③</sup> 尽管西方政治思想家们对此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比如 1970 年帕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1984 年巴伯的《强势民主》、90 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和博曼、罗尔斯、吉登斯等人的协商民主理论,<sup>④</sup>但总的来说,这些努力并没有解决代议制民主与人民主权的结构性矛盾,也难以缓和国际化资产阶级与国内化无产阶级的尖锐冲突。束手无策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仍然惯常以肤浅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失败,比如被蒙骗的人民、任性的人民、无知的人民等等;他们仍然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来解决问题,比如默克尔在美国大选之后对互联网言论管制的言论;<sup>⑤</sup>他们仍然试图通过强调民粹主义的必然失败来让人民清醒过来。令人讽刺的是,至少在欧洲,那些带有强烈民粹色彩的政权似乎目前为止表现得还不错。以抨击 1990 年以来的精英共识<sup>⑥</sup>为政纲的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尽管被欧盟的政治精英严厉批评为“普京化”与“令人想起独裁政府曾经奉行的路线”,<sup>⑦</sup>但截至目前,它们的表现至少还算良好。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齐普拉斯在希腊执政虽然举步维艰,至少也稳住了国家的基本局面,而当特蕾莎·梅措辞强硬地重申“脱欧”决心的时候,英镑甚至出现了小幅上升。当然,人类的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民粹运动虽然经常能够击穿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虚伪

①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6-117 页。

② Phillip Stephens, “Do not Blame Democracy for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 *Financial Times*, 9 May 2013, <http://www.ft.com/intl/cms/s/o/b7a454a6-b893-11e2-869f-00144fefibcico.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June 2014.

③ [英]密尔:《代议制政府》,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6-98 页。

④ 陈炳辉、韩斯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厦门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

⑤ 默克尔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演说中表示:“民主主义者的挑战是接触并启发人民。他们必须面对这种现象,而如有必要须加以规范。”<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11/9724808.html>, 2016 年 12 月 28 日访问。

⑥ Jacques Rupnik, “Populism in Eastern-Central Europ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0-rupnik-en.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⑦ 朱晓中:“‘波兰的民主后退’和欧盟的两难选择”,《世界知识》2016 年第 8 期,第 38-39 页。

与虚弱,却从来难以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但对于今天的欧洲政治精英来说,仅以对民粹运动的标签化的人民主权的批判并不足以让他们获得人民的支持。如约瑟夫·奈在2016年末末时所言,这些想要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精英们显然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不平等,帮助由于变迁而生活无着的人们,并刺激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sup>①</sup>而如果他们既提供不了一个公正的“一体化”,也无法让“代议制”容纳更多与时俱进的人民主权,他们也始终无法摆脱今天所处的危机状态。然而对于欧洲的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的失败并不当然意味着他们的成功,因为只要他们无法从“失语”的状态之中摆脱出来,他们萌生出的主体意识,就更可能为保守的、排外的甚至种族主义的领导者所蛊惑,从而让对旧秩序的自发反抗难以转化为对新秩序的自觉的建设。

#### 四 结语

站在2017年的门槛,思索2016年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的预感。在新近举办的第53届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一严峻的局面浓缩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标题。看起来,历史不仅没有终结,相反无情地终结了那自认为永恒的价值观。“欧洲往何处去”重新成为一个人类社会需要直面的问题。在这个时刻,对民粹浪潮惊恐不安的道德批判,也许只是最无用的反应。对自由主义的拯救也许必须依赖于一场新的启蒙。这场启蒙应将自由主义与历史、民族、信仰等事实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来重新赢得大众的共鸣,而不是仍然诉诸价值观的推演,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来引导与塑造大众的情感。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的成功,是建立在愚昧的大众与资产阶级精英垄断话语权的基础之上,而在这个时代,教育的普及、新媒体空间的出现,正在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民,一种更加难以驯服、更加对精英体制充满对抗意识的大众。资产阶级以民主动员大众获取了权力,却终于在民主的过程中释放了大众。站在这个角度,也许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作者简介: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张海洋)

<sup>①</sup> [美]约瑟夫·奈:“自由主义秩序会幸存下来吗?”,尹红毅译,本文刊发于美国《外交》杂志2017年第1期,转引自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622.html>,2016年12月28日访问。